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晏殊與北宋文化

何綿山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

兩宋是中國文化的又一高峰期。北宋文化經過王禹偁、晏殊等人的努力，最後由歐陽修、蘇軾等人推向高峰。晏殊的成就雖然不可與歐陽修、蘇軾相提並論，但他繼王禹偁之後的承先啟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晏殊從少年時代便勤奮好學，「晚年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¹計有《晏殊集》二十八卷，《臨川集》三十卷，《三州集》十五卷，《二府別集》十二卷，《紫微集》一卷，《北海新編》六卷，《廬山四游詩》一卷，《平台集》一卷，《詩集》二卷，《珠玉詞》一卷，《類要》七十六卷和《集選》一百卷，惜今日大多已不傳。這為進一步研究晏殊造成困難，也正是導致今人對其成就估計不足的原因。因此，目前人們對晏殊的研究，似乎大多還僅停留在對他《珠玉詞》的賞評上，對晏殊在北宋文化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卻評價不足。本文擬就晏殊對北宋文化的貢獻作一些膚淺的探討，以期給晏殊在北宋文化發展中以應有的地位。

一

教育興盛和人才輩出，是北宋文化發展的關鍵，宋代「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麗矣」。²蘇軾《富鄭公(弼)神道碑》云：「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³明徐有貞在《重建文正書院記》中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⁴人才之盛又與教育興盛分不開。晏殊正是北宋振興教育的第一功臣。

改革科舉考試方法，是晏殊振興北宋教育的第一個貢獻。北宋初，科舉考試基本沿襲李唐，進士以詩賦分等第，諸科以帖書、墨義定去留。這種考試遠離現實，考生束縛於詩

1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10197。

2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序》，趙鐵寒主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7。

3 《蘇東坡全集》（上），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頁431。

4 《范文正公集·補編》，清康熙四十六年范氏歲寒堂刻本，卷四，頁十一。

賦聲病的狹窄範圍中，既不能知其德行，也不知其實際能力。有鑑於此，北宋對科學考試進行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仁宗天聖年間的兼以策論昇降天下士；第二次是仁宗慶歷年間的進士重策論和諸科重大義；第三次是神宗熙寧年間的罷詩賦、帖經、墨義，專考策論和大義。這三次改革總的精神是重策論。晏殊在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天聖八年，晏殊上《乞舉人增試策問奏》說：「唐有明經舉人並試策問，蓋欲驗其所業本經大義，以參度性識，然後入官政。今諸科學人，既無策問，但能記誦，不經師授，非所以求人任官之意。乞自今經終場試後，量問策一道，以合舊規。」⁵此後，由皇帝下令，進士科開始兼考策論。所謂兼考，就是兼以策論定去留。策論是一種綜合性練習，所謂策，相當於今天的條件作文，一次考五道題，以設定的「問目」為範圍；論，即命題作文。以策論昇降天下士使社會價值取向發生變化，一些有識之士諸如歐陽修、尹洙、梅堯臣等即循此途脫穎而出。晏殊為了保證考試的公正，提出要對考試中的弊端進行改革，他上《看驗進狀舉人文卷事奏》進言道：「竊聞差中使勾書吏寫進舉人文卷施行。其中小輩素無士行，遞相鼓扇，僥求復考。欲望令中書只差官取進狀人卷子看驗，特與戒勸。」⁶希望能使士子公平競爭，為朝廷多網羅些人才。

大力興學，扶持應天府書院，是晏殊對振興北宋教育的第二個貢獻。天聖五年，晏殊因反對章獻太后任命張耆為樞密使，被罷去樞密副使的職務，從刑部侍郎知宋州（即河南商丘）。他在任上大力興學，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⁷晏殊興學的最傑出成就，就是大力扶持應天府書院，使之與白鹿洞、石鼓和岳麓這三書院合稱為宋初四大書院。應天府書院在今河南商丘故城遺址，原為睢陽戚同文講學之所，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戚同文去世後，此處一度荒置。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應天府民曹誠出資三百萬，在戚同文講學的舊址建屋一百五十多間，聚書千餘卷，招攬生徒。晏殊到應天府上任後，極重視書院的發展。為了扶持書院，他殫精竭慮，想盡了種種辦法，極力延攬得力人才主管書院。天聖五年，范仲淹丁母憂，居應天府。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⁸范仲淹果然不負眾望，訓督學生，甚有法度，執經講解，不知疲倦。「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⁹天聖六年九月，晏殊言請王洙充書院說書，上《薦王洙為應天書院說書奏》說：「應天府舊有敕賜書院，諸生關於師資。伏見部授賀州富川縣主簿王洙素有文行，其明經術，欲就學留，令帶所授官充應天府

5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十），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卷三九七，頁189。

6 同上注，頁186。

7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10196。

8 同上注。

9 《范仲淹年譜》，見周鴻度等編著《范仲淹史料新編》，瀋陽：瀋陽出版社，1989年，頁165。

書院說書。」¹⁰王洙「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學，已滿三年」。¹¹為書院培養了大批人才。天聖六年十二月，「詔免應天府書院地基稅錢」。¹²由於晏殊的極力扶持，再加上應天府密邇東京，學生着實不少，規模日益擴大。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書院為學府，給田十頃。慶歷三年（1043年），又改府學為南京國子監，使書院開始和官學合而為一。當然，應天府書院以後的變遷與晏殊並無直接聯繫，但晏殊在任時大力扶持而打下的基礎顯然很重要。

支持州縣立學，是晏殊振興北宋教育的第三個貢獻。北宋興學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天聖、景祐時期，第二次是慶歷、嘉祐時期，第三次是熙寧、元豐時期，第四次是崇寧以後，而第一次和第二次都與晏殊有着密切關係。第一次興學的特點主要是由私人書院過渡到州縣學校。當時平民之主要想在科場與勢豪弟子角逐，迫切需要一個可提供書籍和師資的場所，於是出現了許多私人書院，例如後來成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的應天府書院就是。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書院時斷時續。在晏殊的極力扶持下，應天府書院才終為應天府學，成為州郡官學，特別是晏殊和范仲淹所聘教師如石介、李覲、胡瑗、孫復等將私人講學所積累的「教養之規」帶進官辦學校的教學組織，為州郡辦學提供了寶貴經驗，這在北宋教育史上有特殊意義。從此之後，州縣學校開始大量湧現。第二次興學的特點主要是由州縣學校的興盛到太學的建立。由於特殊的地位，晏殊在慶歷新政中是個關鍵人物，正如石介在《慶歷聖德詩》中所云：「汝得象、殊，慎重微密；君相予久，予嘉乃績。」¹³興學是慶歷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提出「復興學校，取士本行實」，¹⁴要求興辦學校。仁宗詔令大臣們討論。晏殊以其舉足輕重的地位，極力支持范仲淹的建議。他在《答樞密范給事書》中曾詳細論述了興學之效，指出：「經者，世之常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¹⁵正因為他把「備器之制」當作教育的根本目的，極重視教育的作用，所以和門下士宋祁等都明確表示贊同范仲淹的主張。宋祁等還上奏，要求建立州縣學校，於是「慶歷詔諸路州府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多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¹⁶地方學校如雨後春筍般

10 《全宋文》(十)，卷三九七，頁188。

11 《全宋文》(九)，卷三九〇，頁459。

12 《宋會要輯稿》，大東書局影印徐星伯稿本，1937年，卷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五，第五十四冊，「崇儒」二之二。

13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二六，頁3401。

14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十通本，1986年，卷三一，「選舉四」，「考」頁290。

15 《全宋文》(十)，卷三九八，頁196。

16 《宋會要輯稿》，卷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五，第五十四冊，「崇儒」二之二。

湧現，一直影響到熙寧，正如《宋史》所記，「自仁宗命郡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寢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¹⁷

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教學內容，是晏殊對北宋教育的第四個貢獻。北宋初，私人書院極為興盛，但教師泥沙俱下，有的隨心所欲，教無所依。針對這種情況，晏殊指出：「前代為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生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為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竊志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倡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不能及也。」¹⁸ 表示了他對講課內容的關注。

北宋人才輩出，與各名臣宰輔薦人之風盛行有着密切關繫。晏殊是首開北宋薦人風氣的主要人物，《宋史》稱他「善知人」。¹⁹ 晏殊薦人有五個特點：一是注重綜合型全面人才。如晏殊向朝廷推薦范仲淹時下的評語是：「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²⁰ 這裏包括儒學、文章、吏才、德行四方面的知識結構。這使西漢儒生與文吏相輕而不相兼、唐代重進士而輕明經的局面在宋代得以改觀，其後的歐陽修、尹洙、蘇舜欽、蔡襄、蘇軾、曾鞏等，都是全面發展的綜合性人材；二是重才幹不重身世。如歐陽修在當時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曾兩次參加科舉考試都名落孫山，不僅出身寒微，且身材瘦弱，表面看上去並無過人之處。晏殊在天聖八年（1030年），發現了歐陽修答卷寓意深邃，即選拔歐陽修為進士第一。「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為第一」。²¹ 不僅如此，慶歷三年（1043年），「殊初之相，擢歐陽修等為諫官」。²² 晏殊對雖有資歷，但達不到要求的求職者，並不予通融。晏殊在主館職時，苗振以第四人及第的資格召試館職，晏殊認為苗振因久從吏事，必疏筆墨，要他回去溫習後再來就試。苗振以為已有進士出身，想以老賣老，討些便宜，但晏殊卻不賣帳，最後不中。與擢拔寒士歐陽修相比，真是涇渭分明。晏殊愛才心切，曾有求賢若渴的詩句：「莫惜青錢萬選才」。²³ 歐陽修曾稱其「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²⁴ 這種唯才是舉的行為，在封建士大夫中是難能可貴的；三是重

17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選舉一」，頁3604。

18 《全宋文》（十），卷三九八，頁197。

19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10197。

20 《全宋文》（十），卷三九七，頁186。

21 《歐陽修年譜》，見《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頁3。

22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錄校補》（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56。

23 《全宋詩》（三），卷一七一，頁1944。

24 歐陽修《六一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13。

事實不重個人恩怨。如范仲淹在服母喪時，晏殊就延其掌學，後又於天聖六年(1028年)力薦范仲淹到京城任秘閣校理。第二年，因章獻劉太后冬至受天子和百官朝賀祝壽事，晏與范之間發生了一場尖銳衝突，但事後晏殊並不記恨在心。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人誣陷，晏殊仍上書力陳「仲淹素直」，²⁵極力保護范仲淹，終於使范免罪；四是重本事不拘小節。如王琪、張亢皆為晏殊上客，但二人皆其貌不揚，王琪骨瘦如柴，雙目如牛；張亢上體肥胖，雙目如猴，二人還不顧場合，互相譏諷，且出言不遜，實有失體統，甚至玩笑多次開到晏殊頭上。因前者有文才，後者有武經，愛才如命的晏殊毫不介意，特請於朝，舉館閣校勘王琪為應天府簽判，並延張亢為幕府。在《示張寺丞王校勘》詩中，晏殊把張、王二人比作當年梁園中的司馬相如與枚乘之輩，可見是何等的器重。這兩人果然不負重望，後來王琪累官至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張亢官主徐州防禦使、徐州總管，曾親自率兵多次打敗西夏入侵者；五是勇於堅持標準，不畏權貴。在擢拔人才時，晏殊決不盲從。如章太后要召張耆為樞密使，晏殊在《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奏》中大胆進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賢，亦不宜使中材處之。耆無他助勞，徒以恩幸，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材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²⁶晏殊這種寧缺勿濫、擇優進薦的主張，使北宋朝廷引進了不少棟樑之材。「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台閣多一時之賢。帝奮然有意，欲因羣才以更治，而小人、權幸皆不便」。²⁷一時朝中人才雲集，以致連皇上都想有所作為，可見其影響之大。值得往意的是，晏殊所開舉賢薦材之風盛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並蔚然成風。被晏殊薦舉的范仲淹和歐陽修薦人尤多，其中不少被薦者因為有了施展身手的機會而聲名赫赫，彪炳千古。如范仲淹之薦孫復、石介、胡瑗、張載、李覲、蘇舜欽、周堯卿等；歐陽修之薦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劉攽、司馬光等。

晏殊通過振興教育和學薦人材，為北宋培養、網羅了一大批有識之士。正是這些名士，對北宋文化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

北宋重視對書籍的蒐集與整理，重視編寫史書，這對進一步推動文化發展有着重要意義。晏殊在這方面也有突出貢獻。

晏殊七歲能文，曾從神童薦。十四歲時，被召試入館閣讀書。當時的館閣是官家藏書之處，也是編書、校書之所。晏殊進了館閣後益加奮發，《臨川縣志》曾記載皇上對晏殊的

25 陳師道《後山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四，頁42。

26 《全宋文》(十)，卷三九七，頁188。

27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10197。

讚賞：「真宗曰：『近聞館閣臣僚嬉游彌日，唯殊杜門講習。』」勤奮好學的晏殊以其廣博的知識和高深的造詣，在古籍整理與蒐集、史書編寫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績。

(一)積累書籍。晏殊重視積累書籍和改善條件。他曾在《請賜舍人院書籍增給財物奏》中呼籲：「本院書籍殘缺，帷帳什物多弊，公用錢亦少。望賜國子印本羣書，令儀鸞司供帳，冬季三司給炭，仍增賜公用錢。」²⁸千方百計為從事編校人員提供條件。

(二)編撰史集。晏殊曾「刪次梁、陳以後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²⁹撰寫了大量秘藏供御典籍圖書，並綴典實，歷門別類，編成《類要》一百卷，以為「瀨祭之資」。晏殊還奉旨撰修了《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³⁰乾興元年天聖中，作為翰林侍讀學士的晏殊奉旨從《冊府元龜》中掇其美事，傳其要者四十卷，為二百一十五門，名曰《天和殿御覽》。仁宗嘗謂輔臣曰，《天和殿御覽》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並說：「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跡，以為鑑戒。」³¹可見宋仁宗對此書的重視。天和殿是禁中藏書之所，各類資料豐富，晏殊從一千卷《冊府元龜》中刪繁去粕，下了很大功夫，正如他在《天和殿御覽序》中所言：「上稽雅誥，下採信書；削糟粕之繁，撮丹青之要。」³²此書被稱為《冊府元龜》的縮本，在當時曾鏤板流行。

(三)著寫域志。晏殊曾於天禧二年(1018年)任職史館，掌修國史、日曆及典圖籍之事。他充分利用館閣豐富的史料，著寫了《天聖十八圖》、《方岳志》、《輿地志》等輿志。

(四)校訂典籍。北宋館閣極重視校勘，凡館閣藏書，都要經過校訂。一般由校勘官校好，再送復校勘復校，接着再送主判館閣檢校，最後由兩制擇官一、二人復校。北宋館職中職務最高為直集賢院，其次為集賢校理，最低為秘閣校勘。晏殊十九歲即為集賢校理，二十八便被擢為直集賢院，這是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勘之事的最高職務，他不但極力組織館中人員校勘，還親自動手校訂了許多重要書籍，如親自校注了《世說新語》三卷本。《世說新語》流傳最早的刻本為南宋的三種刻本，即：宋高宗紹興八年董夔刻本、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陸游刻本、宋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而這三種刻本皆源於晏殊手訂本。晏殊還在校訂時做了詳細的注疏，正如陸游在替所校本跋時說：「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如小加剪截，最為善本。」³³對董本，宋代目錄學權威陳振孫亦指出：「此本董令昇刻之嚴州，以為晏元獻手自校訂，刪去重複者。」³⁴晏殊還替不少集子做過注，

28 《全宋文》(十)，卷三九七，頁186。

29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10196-10198。

30 同上注，頁10196。

31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46。

32 《全宋文》(十)，卷三九八，頁200。

33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933。

34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一，頁316。

今可查的如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宋刻本(一說元刻建本)《增廣注釋音唐柳(宗元)先生集》中可看到有晏殊的注文收入其中。

(五)捐贈古本。北宋皇帝重視文化積累，爲了充實館閣藏書，多次下詔募亡書和獎勵獻書，晏殊積極響應，獻出家藏書籍多部，使許多書籍得以齊全地保存下來。如《柳子厚文集》是晏殊家藏的珍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柳宗元文集》在宋時總有四本，其一爲晏元獻家本。」³⁵ 後來校訂此書的學者都認爲這四種版本中，晏本最爲精密。

(六)宣傳他人。晏殊曾爲許多人的文集寫過序，熱情宣傳這些集子。如替徐鉉的《徐騎省集》、宋行古的《崇天歷》、宋祁的《出塵集》等寫過序，爲宋景文詩作跋，極力推重介紹。由於晏殊的特殊地位和名望，經他介紹過的集子，自然也就提高了知名度而更加流傳了。

各種藝術的成熟是北宋文化繁榮的主要標誌之一，作爲文化宰相的晏殊，對各種藝術都有很深的造詣和鑒賞能力。中國戲劇萌芽於唐代，宋代開始逐漸趨於成型。但傀儡戲在宋初已達到「奪造化通神明」的境地，晏殊對這種傀儡戲的藝術很有研究。《韻語陽秋》卷十七記載道：「晏獻公嘗爲《傀儡賦》云『外眩刻雕，內牽纏索，朱紫岔並，銀黃煜燿。生殺自口，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³⁶ 宋代書法，較之唐代，有一種新局面和新趣味。北宋士大夫多尚書學，晏殊的書法以「率真」見長，在當時頗有名氣。歐陽修曾讚嘆道：「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³⁷ 晏殊書法曾被收進《羣玉堂帖》中，正如《書史會要》所載：「元獻擅豪翰，其跡雜見《羣玉堂帖》中。」³⁸ 此帖初名《閱古堂帖》，係宋韓侂胄從家藏名跡中命其客向若水所摹勒，摹刻極精，紙墨均妙，惜現完本不傳，僅二、三殘本在世。「飛白」是一種書寫方法特殊的字體，亦稱「草篆」，筆畫呈枯絲平行，轉折處筆路畢顯。晏殊對此頗有研究，寫過《飛白書賦》、《御飛白書扇賦》、《謝賜飛白書表》、《御飛白書記》等文，對書法藝術的鑒賞表示了獨到的看法，並對「飛白」有過精彩的描述：「萬象奔馳於筆端，三辰奮湧於毫末。翩然而鸞皇飛煮，婉然而虬龍蟠躍。」³⁹ 他還用習書必須廣採衆長來比喻作文不可機械模仿，他說：「譬之工書，鍾、王、衛、索，歐、虞、褚、柳，雖迭相師慕，及其成功，未嘗酷似，豈不然乎？」(《與富臨丞書》)⁴⁰ 雖然他旨在說明作文酷似並不意味着成功，要有自己的風格。但從其歷數魏鍾繇、晉王羲之、晉衛夫人、晉索靖、唐歐陽詢、唐虞世南、唐褚

3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一五〇，頁3144。

36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25。

37 《歐陽修全集》，卷二十三，頁535。

38 馬宗霍輯《書林藻鑒》，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卷九，頁122。

39 《全宋文》(十)，卷三九八，頁203。

40 同上注，頁198。

遂良、唐柳公權等書法名人可看出他對書法藝術是有一定造詣的。晏殊還精於音樂，多次參與審議有關音律之事。如景祐五年（1038年），右司諫韓琦在看了《景祐廣樂記》之後，請仁宗將李照所造樂器換成太常寺原來的樂器，仁宗「詔資政殿大學生，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⁴¹晏殊等人經過認真審定，指出「鍾磬不經鐫磨者三縣奇七虛，郊廟，殿庭可以更用」。⁴²「鐫」「磨」都是鍾和磬調音的方法，審定鍾、磬音律是否準確，一定要有精深的音樂造詣。據載仁宗聽信了晏殊等人的審定意見，下詔不再施用李照的樂器。

北宋是學術思想特別活躍的時代，「宋人言詩」蔚為風尚，從而導致詩話的誕生。晏殊以其特殊身份，談詩論詩，表達了自己的詩學主張，豐富了北宋的詩學理論。雖然他沒有象歐陽修那樣有《六一詩話》等較系統的詩學理論，但由於他的顯赫官職和廣泛的交往使他在文壇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生過一定影響，北宋後的許多詩話對他的詩學主張多有記載。綜觀他的詩學主張，可看出在當時還是很有見地的。

不重「金玉」重「氣象」，是晏殊詩學主張中最有積極意義的部分。《仕學規範》卷三十八記道：「晏元獻公喜評詩，嘗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此善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⁴³前者雖「金」、「玉」，卻是字面上富貴，給人鑲金雕玉之感；後者出乎天然，不言富貴，而富貴自現。晏殊這種藝術見解，與那些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綺靡濃艷的西昆體相左，為詩壇引進了一些新鮮空氣。《仕學規範》卷三十八還記道：「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語富貴者。』故公每吟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⁴⁴這裏所說的「氣象」，頗接近後世的「意境」。晏殊不追求字面上的「金玉錦繡」，着意於「氣象」上的渾然天成，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雖然他的審美旨趣還很難脫離臺閣文人特有的「富貴」情調，但正是因為他也是個臺閣文人，才尤為可貴。

追求高雅，但並不認為「雅」就是「深不可測」，是晏殊又一詩學主張。宋張舜民《畫墁錄》記道：「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絲絃慵拈伴伊

41 《宋史》，卷一百二十七，《志》第八十，《樂》三，頁 2961。

42 同上注。

43 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614。

44 同上注。

坐。」柳遂退。」從中可看出，晏殊自詡高雅，鄙薄柳永的庸俗淺露，尤其看不起那些充滿俚詞、缺乏含蓄和韻味的作品。但晏殊的所謂高雅，並非就是令人費解，而是講究貼切自然。《西清詩話》記道：「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儉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⁴⁵可見，晏殊並不因別人認為他的詩「俗」、「淺」而不安，他注意的是每句用的是否得當。

寫詩須經苦吟精改，是晏殊的一向主張。他不主張隨便出手，信筆而去，而是「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⁴⁶晏殊對自己所寫的詞句是有很高要求的，絕不草率了事。他最為人傳誦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就是幾經周折而對上的。由於晏殊對語句要求極嚴，故不少文人墨客，「為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⁴⁷晏殊改詩的標準與他重「氣象」，輕「金玉」的審美情趣是一致的。一次有人寫了一聯詩句「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閑守漢樓舡」，向晏殊請教，並「注『空』字於『閑』之旁，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⁴⁸時人由此稱晏殊「務求博約」，「情實純至」。⁴⁹

晏殊的許多詩歌主張是通過與詩友的討論表現出來的。《臨漢隱居詩話》記載：「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曾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恁地作鬧。』」⁵⁰。晏殊想就眼前景作詩，不願牽扯風雪中守邊的將士，是與他少到邊關、過着閒適生活有關。晏殊常與梅堯臣論詩，梅堯臣在《以近詩贊尚書晏相公》詩中寫道：「嘗記論語詩，辭卑名亦論（公曰名不盛者，辭亦不高）。寧從陶令野（公曰彭澤野逸田舍之語），不取孟郊新（公曰郊詩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⁵¹傳達了晏殊的詩學見解，頗有獨到之處。特別他從陶詩的「氣象」上來理解陶詩，固然是因為陶詩中那種悠然閒適的情趣極合他的詩學主張，但與他有較高的品賞能力也分不開。晏殊從陶詩表現的內容和精神面貌上來理解、把握陶詩，與同時代的其他詩人僅把陶詩作為語言材料相比，是有超越意義的。晏殊還常借鑒前人詩歌的藝術，來表現自己的藝術追求。如晏殊對馮延巳、韋莊等人

45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175。

46 厲鶚輯撰《宋詩紀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七，頁174。

47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頁178。

48 同上注。

49 同上注，頁178—179。

50 《歷代詩話》（上），頁329。

51 《全宋詩》（五），卷二四七，頁2903。

推崇備至，「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⁵²「晏元獻『春水碧於天』，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⁵³ 韋莊詩作的主題多為傷時懷古離情感舊，馮延巳的詞作多寫官僚的享樂生活和男女間的離愁別恨，但他們的作品都較少脂粉氣和雕琢之弊，語言清麗，委婉深情。晏殊受其影響，又不僅拘於此，故能自成一種風格，正如後人所稱：「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⁵⁴ 晏殊對韋應物的詩倍加讚賞，並根據其清雅特點，精選了別具一格的《集選》五卷，其中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對當時詩壇產生了積極影響。

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運動在理論上奠定了散文創作的基礎，北宋初期一些士大夫標榜韓柳古文，反對晚唐五代浮靡之風，晏殊也是韓、柳古文的積極推崇者，對韓、柳有過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若乃扶道垂教，劃除異端，以經常為己任，死而無悔，則韓子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詞比事為工也。如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轍三古，下籠百氏，極萬變而不浮，會衆流而有歸，適然沛然，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其人也。彼韓子者，特以純正高雅，慄然無雜，乃得與之齊名耳。必也兼該汜博，馳騫奔放，則非柳之敵，況他人哉！獨孤、權、劉或及其門，或升其堂，未可以造室也。然後之學者，但常揭厲仰，就其所安，不必索強模寫，失其天質。」（《與富臨丞書》）⁵⁵ 晏殊指出韓、柳散文的各自特點，這是基本符合他們創作實際的。晏殊還認為學韓、柳散文主要得其神，不一定字句照搬。晏殊的看法是以倡導韓、柳散文為己任的柳開、王禹偁等人的繼續，客觀上為歐陽修再一次掀起詩文革新運動做了準備。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四

宋初詩歌沿襲晚唐、五代風氣，意境狹窄，缺少變化。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標舉李商隱詩，使西昆體風靡一時。他們專重形式，嚴重脫離現實，帶來了新的弊端。直到梅堯臣、歐陽修出來，才為宋詩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而從西昆體到梅、歐的詩風轉變過程中，晏殊是最為關鍵的一個人物。這是因為：

（一）晏殊與西昆體作家有着密切聯繫，但在創作上又有自己獨特之處。劉放在《中山詩話》中說：「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昆體。」⁵⁶ 其實《西昆酬唱集》中並無晏殊的作品，但卻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晏

52 《歷代詩話》(上)，頁 292。

53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 305。

54 魏慶之編《詩人玉屑》(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二十一，頁 467。

55 《全宋文》(十)，卷三九八。頁 198。

56 《歷代詩話》(上)，頁 287。

殊與他們的密切關係。晏殊曾受業於楊億，又與劉筠、錢惟演同在密閣編書，他在《劉筠序班奏》中言：「先朝楊億再為學士，班錢惟演上。今新除學士劉筠，又禧中已入翰林，請如故序班臣等之上。」⁵⁷ 關係密切，可見一斑，受其影響是必然的。但晏殊的詩與西昆派畢竟不同，這倒不是由於他的詩未收進《酬唱集》中。錢鍾書先生對此有精到見解：「也許因為他反對『脂膩』，所以他跟當時師法李商隱的西昆體作家以及宋庠、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較活潑輕鬆，不象他們那樣濃得化不開，窒塞悶氣。」⁵⁸

(二)晏殊與梅、歐有着極密切關係，給他們以極大影響。晏殊曾與梅堯臣多次談論詩文，晏殊對詩歌的理解曾對梅堯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梅堯臣對晏殊推崇備至，經常與晏殊唱和，多次向晏殊請教。歐陽修更是因晏殊薦舉而得進階的，二人關係甚為密切，歐陽修曾親自替晏殊撰寫《神道碑銘》，並在《六一詩話》中稱：「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為詩。」⁵⁹ 二人酬唱詩文甚多，歐陽修受晏殊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三)晏殊所處的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時代。西昆體風靡一陣後，到晏殊時已逐漸走向沉息，詩壇開始醞釀新的突破，晏殊以他傑出的才能和特殊的身份，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過渡階段的主要人物。宋人對晏殊的詩予以很高評價，認為他「尤長於詩」。⁶⁰《宋史》也認為他「尤工詩」。⁶¹ 但晏殊的詩作到底有多少，至今沒有準確數字。宋祁在《筆記》中記道：「晏相國，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所未有。」⁶² 宋祁為晏殊門生，與晏殊過往甚密，「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⁶³ 宋祁的記錄，當多少有些根據。《詩事》卷十八也記道：「晏元獻文集詩最多，幾萬餘篇。」⁶⁴ 如果是真的，比「六十年間萬首詩」的陸游還多，可稱中國詩史上第一位高產作家，惜流傳下來太少，今日流傳的主要見於清胡亦堂所輯《元獻遺文》、清勞格的《補編》和李之鼎所輯《晏元獻遺文》等之中。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進行重新補輯、編次，定為三卷。其得之於《會稽掇英總集》等宋人作者，為第一卷；得之於宋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者，為第二卷；得之於元、明、清諸人著作者凡十八首，與輯出零句，合編為第三卷。計有詩 218 首零句 59，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詩》第三冊卷一七一—中，是目前收集晏殊詩最全的本子。

57 《全宋文》(十)，卷三九七，頁 186。

58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 13。

59 《六一詩話》，頁 13。

60 《宋詩紀事》(一)，卷七，頁 174。

61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 10197。

62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頁 178。

63 同上注，頁 177。

64 常振國等編《歷代詩話論作家》(上)，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 583。

對於晏殊的詩，有兩種似已成定論的看法而實則有失公允。第一種看法是認為晏殊的詩不過是歌咏禁中生活，應製和御製及與僚佐門屬唱酬，沒有積極意義，缺乏現實內容，並常援引《石林詩話》中的記載來說明：「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賞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云最深處，試憑弦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⁶⁵ 似乎晏殊是個只會通宵暢飲的官僚。其實晏殊有縱情娛樂的一面（這與當時社會風氣有關），也有勤政憂民的一面，如他在《乞選人更不隔年預使季闕奏》、《乞令場務不得妄增課利奏》、《差剩員兵士代百姓充驛子奏》、《乞罷職田狀》⁶⁶ 中，表示了對國計民生的思考和對百姓的同情，他在詩《雪中》寫道：「平台千里渴商霜，內史憂民望最深。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⁶⁷ 借雪景表達了對農民生活的關心和憂慮。而從《石林詩話》的這則記載中卻可看出晏殊把寫詩作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是生命的一部分，實在是嗜詩如命的文化宰相。

第二種看法是認為晏殊為官小心謹慎，不敢在詩中表達自己真實感情，在皇上和各派夾縫中討生活，⁶⁸ 故其詩大多枯澀空泛。這是不了解北宋社會政治狀況。事實北宋文人言論最自由，「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⁶⁹ 「二百年未嘗誅殺大臣」。⁷⁰ 生命既無危險，議論自由自然就有保障，但可直言不妨。《宋史》記載晏殊公然與太后唱反調，「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⁷¹ 《歸田詩話》中還記載：「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⁷² 這兩則都說明晏殊並非膽小怕事之輩，而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且公開犯上，也無大妨。晏殊詩所以不象詞那樣充滿真性實感，是因為北宋中期士大夫仍把詩當作傳統的創作，詞不過是「詩餘」，難登大雅之堂，因此只可借詞吟詠性情，抒發內心感受。

《宋史》認為晏殊的詩「閒雅有情思」，⁷³ 應該說，這種評價是較為公允的。所謂「閒

65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頁 178。

66 參見《全宋文》卷三九七，頁 186 - 189。

67 以下所引晏殊詩均見《全宋詩》（三），卷一七一至一七三，頁 1940 - 1968。

68 參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三），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年，頁 65。

69 《蘇東坡全集》（上），續集卷十一，頁 338。

70 《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十五，頁 159。

71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 10196。

72 《歷代詩話續編》（下），頁 1271。

73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頁 10197。

雅」，指晏殊的詩有着一種雍容富貴的風度，抒發的是士大夫的閒情雅志，不少詩歌為應製酬唱之作，刻意雕鏤，綺麗華瞻。如《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綉索軒窗邃，蠻披羽衛重。烏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得三英集，詩須五吏供。會看邊遂息，橫需紫泥封。」宋子京(宋祁)為晏殊的得意門生，過從甚密，這種詩寫起來本該很有感情，但全詩卻由於一味雕鏤，顯得詰屈聱牙，毫無詩意。再如《春陰》：「十二重環悶洞房，愔愔危樹俯迴塘。風迷戲蝶閒無緒，露裊幽花冷自香。綺席醉吟銷桂酌，玉台愁作澀銀簧。梅青麥綠江城路，更與登高望楚鄉。」晏殊力圖表現一種「氣象」，由於過多堆砌詞藻，使全詩缺乏內容，表現出的是一種無聊空虛的情趣。但另一方面由於晏殊並不熱衷於富貴，淡泊超然，所以他的一些詩雖「閒雅」，卻也並不粉脂氣十足，而是透出一種安閒和寧靜，表現出一種恬適安寧的心境。如：「西齋輝赫亘山隅，嘉致清風世莫如。鄉黨名流依絳帳，煙蘿幽境似仙居。……碧沼暮涼浮菡萏，紗窗秋靜漏蟾蜍。閒庭瀟灑移泉石，華表崢嶸冠裏閭。」(《過華夫書屋》)再如：「斑斑疏雨欲晴天，迴避春風入醉眠。新火未來絲閣靜，砌苔樹樹兩依然。」(《次和參政陳給事寒食杜門感懷》)自然界是這麼安閒、寧靜，一切都那麼和穆，掩蓋着詩人那雍容悠閒的形象。不過，無論怎麼說，晏殊並沒有完全擺脫西昆體的影響，也沒有徹底擺脫五代綺麗的詩風。

所謂「情思」，即「情中有思」，在情感的抒發中始終不忘理性的思索，用情景交融的手法表達某一種思想或情趣。《觀齋詩話》認為晏殊詩「亦有思致，不減唐人」，⁷⁴是有道理的。晏殊對宋詩的貢獻，正是這些富有「情思」的詩歌。與唐詩相比，宋詩顯得理趣十足，不少詩為明理而失之晦澀枯淡。晏殊卻有不少「情思」之作。如《無題》：「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迹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煙中。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這是宋詩中很有特點的一首詩，含蓄地表達了一種「怨別」的情致。全詩旨在寫「怨別」，卻不直接點破，整首詩字面上無一字寫怨，「不再逢」、「任西東」、「溶溶月」、「淡淡風」、「寂寥」、「蕭索」、「水遠山長」等處處隱含着「怨」字，「處處同」更形成「怨」的高潮。將難言之隱，用寫景寄興來表達，蘊藉深沉，纏綿悱惻。馮班評這首詩時說：「次聯自然富貴，妙在無金玉字；腹聯清怨，妙在無粉膩氣。此艷體之甲科也。」⁷⁵即使是娛賓遣興之作，晏殊有時也能別開意境，另出生面，如《示張寺丞王校勘》：「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灑灑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游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首聯用白描手法勾畫出一個在清幽園林中徘徊的自我形象，頷聯將景、物、情交融一體。頸聯在委婉淒迷的意境中寫景抒情，尾聯反轉點題。全詩波瀾曲折，富有詩意。晏殊有的咏物詩也

74 《歷代詩話續編》(下)，頁 324。

75 錢仲聯選《宋詩三百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204。

能別出機杼，如《中秋月》：「一輪霜影轉庭梧，此夕羈人獨向隅。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華孤。」雖用李商隱《常娥》、《月夕》等詩句意，卻能造出一種靜謐孤清的新境界，透出一種淡淡的寂寞哀愁。再如《西垣榴花》則通過咏花來托寓自己守清持節的情意，《咏上竿伎》則旨在勸諷人世翻覆機巧，主張為人淳樸正直。

晏殊的「情思」還有多種表現形式，他善於就眼前所見發出感慨，似乎信手拈來，卻蘊含着頗為深厚的內涵，如：「臨川樓上柅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全柅園》）詩人借眼前景物，表現了一種曠達、沉着的胸襟。再如：「草庵何似清風樓，更在空中最上頭。眼界豁開無畛域，枯藤古木暮煙浮。」（《白雲庵》）詩人抓住白雲庵的特點，創造出一種開闊古寂的境界，隱隱傳達出一種悲涼之感。晏殊一些詩雖然明白如話，脫俗清新，卻因感情深摯而顯得底蘊十足，意味深長。如：「不忍與君別，憐君仁義人，三年宮滿後，依舊一家貧。」（《贈李陽孫》）與友人送別，不是願他從此發達，而是認為貧困依舊，看似大煞風景，卻別有趣味。晏殊還有一些詩能準確抓住事物特點，給人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因此再三誦讀，還覺回味無窮，如：「卷簾山色眼前見，入夜濤聲枕上聞。苔徑雨餘堆落葉，石樓風靜鎖寒雲。」（《崇因寺》）「眼前見」、「枕上聞」從視覺、聽覺入手，「堆」、「鎖」傳達出一種空寂、孤靜的氣氛，仿佛讓人置身寺中，頗有惘然隔世之感。

晏殊有不少詩，若從整首來看，似失之雕鏤，但卻不乏有一些富有「情思」的精妙句子鑲嵌其中。如「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雁入南雲」，（《寄遠》）「平蕪遠水知何許，眼裏迢迢空處所」，（《寒食東城作》）「甘擋柳苑秋風急，欲為流螢下詔中」，（《王文通詩》）或傾訴難以表達的衷情，或表現一種深沉纏綿的惆悵；再如：「樓台冷落收燈後，門巷清虛掃雪天。」「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宋翰維《南陽集》卷一二）「靜尋啄木藏身處，閒見游絲到地時。」（同上）或勾畫出一種清曠和穆的情景，或透露出一種微帶溫潤的閒愁；又如「春風任花露，流水放杯行」，（宋江休復《嘉祐輝又》卷二）「遊人已著濃春去，不待歌長舞袖翻」，（《上巳瓊林苑宴地府同游池上即事口占》）「螢稀燕寂高窗暮，正是西門玉漏長」，（《賦得秋雨》）或傳達出一種從容曠達的情致，或描繪出一種令人神往的恬適靜謐的境界；還如：「竹醉人還醉，蠶眠我亦眠。」（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窗南高臥追涼際，時有微香逗晚風。」（《紫竹花》）又是何等的超脫愜意，何等的優雅雍容。這些佳句在當時曾廣為傳誦，宋人甚至將其題於齋壁，反復把玩。明瞿佑在《歸田詩話》中稱「晏元獻公詩，不用珍寶字，而自然有富貴氣象。」⁷⁶可謂點出了晏詩用語自然、渾然天成的特點。

五

詞盛於宋，堪稱「一代之文學」，而晏殊則是將詞從晚唐五代過渡到北宋的關鍵人物。「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為北宋倚聲家初祖」。77 在宋詞發展史上，晏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晏殊對發展宋詞的主要貢獻，一是擴大了詞的內容，將詞從燕釵蟬鬢的宮體倡風過渡到表現生活中的真情實感；二是創造了新詞牌，對詞牌的創造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三是豐富宋詞的表現手法，突出地運用「婉」之法，亟寫心中之情思；四是開拓了詞的風格流派，開宋詞婉約之先聲。對晏殊的第一、二、四方面的貢獻，已有許多文章論及，並多有精僻見解，此不再贅述。本文僅就其第三個貢獻，即晏詞「婉」之特點，談一些看法。

後人對晏殊詞的研究，還較為籠統片面，不但把晏殊混同晏幾道，甚至混同於李煜父子。或認為「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78 或認為「晏氏父子，嗣響南唐二主，才力相敵」。79 其實，即使同是感傷詞，他們之間還是有着明顯區別的。晏殊的感傷詞寬舒閑適，清麗溫雅，詞中充滿着圓融的觀點、理性的操持，是一種春花秋月的輕愁淡恨；晏幾道的感傷詞低徊幽峭，淒楚哀怨，詞中充滿執着的追求、貞摯的痴情，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深沉憂悵；李煜的感傷詞淒愴悲鬱，萬念俱滅，詞中充滿家愁國恨、憂憤惆悵，是一種令人心死魂斷的絕望之恨。過去人們在論及晏殊《珠玉詞》時，常認為晏殊不過是在過分滿足的生活裏找了一點閑愁來吟咏一下，並往往援引葉夢得《避暑錄話》中對晏殊的記載，「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由此來說明晏殊生活的優裕。其實晏殊僅當過一年多宰相，他曾因得罪朝中權貴，多次被放在外為官，仕途並非十分得意。於做官之中產生出一種不愜意的憂愁，是很平常的。因此，晏殊的「愁」並非完全「無病呻吟」，也並非完全「自找煩惱」。

晏殊的《珠玉詞》雖言愁，卻又能隱隱透出某種曠達和超脫，最終能從愁中轉出，因而顯得神清氣通，雍容大度，這是晏殊詞之「婉」的主要特點之一。其主要表現為：（一）似乎因外物所觸而生愁情，實則達觀思想已在其中。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80（《浣溪沙》）詞人看到自然界的「花落」、「燕歸」，發出哀嘆，委婉地表現了詞人對光流年逝的愁感。但另一方面，詞人於主觀的「無可奈何」中感覺到客觀事物是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的，於「似曾相識」中體會到事物在時間的流逝中已發生了新的變化。在惜春的哀悼中，隱透出對消逝無常與循環不已之兩種宇宙觀的對比觀照，由此表現出某種達觀——萬物有

77 馮煦《蒿庵論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59。

78 吳林抒校箋《小山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6。

79 同上注，頁201。

80 文中所引晏殊詞均見吳林抒校箋《珠玉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去」有「來」，這是自然界的正常規律。(二)在愁感中隱透着慰解，隱藏着處置的方法，使愁感在思考和節制中得以解脫。「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浣溪沙》)行人遠去，因遠隔山河，空念無益；面對落花風雨，只能更為傷感。「空」與「更」固然是雙重哀感的結合，卻也透出感傷徒然無益的理性認識，詞人從中得出一絲慰解。最後提出排解的方法：不如珍惜、把握現時的一切，從徒然的感傷中回到現實。(三)從人事之變中透出離愁，同時又用萬物之不變，將離愁轉化得恬然寧靜。「人面不知何處去，綠波依舊東流。」(《清平樂》)雖然心上人不知去向，但自然界並沒有因之違反它的規律，一切都依舊。通過變與不變的對比，一方面表達出愁感，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徒傷無益的思致。詞人將人去物空的愁感轉化為圓融平靜的心境，顯示出曠達的懷抱。(四)在表現愁感的同時又創造出闊大的境界，從而引起讀者的哲思，藉以沖淡愁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蝶戀花》)西風、落葉寫出了環境的清冷；「獨上」點出了詞中人形單影隻；「望盡」表現了離情之深。遙望而不能見，愁感本應愈轉愈濃，但詞人把離情從幽閉的閨房移到視野開闊的背景上，創出新境界。

晏殊還擅於將外物與內心感受結合起來，給那些溫潤的珠玉染上一種淡淡的愁感，顯得溫厚疏淡，圓融閑適，這是晏殊詞之「婉」的又一主要特點。其主要表現在：(一)借用自然界之外物表現愁情，表面上只是客觀地再現當時景物，實已情與景會——在閑適的景物中表現出閑適的愁情。「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踏莎行》)詞人夢回酒醒，見夕陽西下，才知一天又過去了，遲暮之感油然而生。於是舊愁(愁夢)剛結，新愁又起，似乎愁緒不斷。但這種遲暮之愁不過是酒醉飯飽後的閑愁，藉以沖淡過度舒適的油膩罷了，因而於愁情中透出溫情，顯得圓融閑雅。(二)用有代表性的景物構成清冷悲涼的環境，並同時點出愁感。由於這些景物本身就帶有愁意，所以點出的愁感不是被逼出來的，而是這種環境的說明和注腳，似乎不是在主觀抒發，而是在客觀敘述，於迷離惘恍中表現出某種溫靜。「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木蘭花》)「五更鐘」、「三月雨」本來就是產生愁情的時刻，詞人稱之為使好夢殘破，使離愁頓生，是自然的。在這時刻產生愁情，人皆會如此。詞人沒有表現出自己對愁的獨特感受，而是在愁感中透出坦然，於不平靜中表現出平靜。(三)以敏銳的感受，通過自然界微小的事物道出愁情。由於這種感受是纖細的，因而表現出的愁情也是纖細的，絲絲愁情中隱透着縷縷溫情。「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欄總是消魂處。」(《踏莎行》)雖然花草都染上了愁，但這種愁是幽微的，如煙似露，瞬間即逝。連這種淡愁都受不了而要消魂，足見其並無多少真可消魂的愁情。

賦在宋代雖然不是主要的文學樣式，但在北宋仁宗及神宗時卻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即：第一，以議論為宗，一些鋪述、描寫手法較多的宋賦也旨在寄託某種理趣，而有相當部分簡直就是詁語論文，這與漢賦尚鋪敘、魏晉之後賦尚抒情、唐賦某種程度的散文化截

然不同。第二，擴展了賦的題材，除了大量的寫典禮、宮殿、京都等歌功頌德的大賦外，狀寫士大夫家中的園亭齋室和各地樓台亭閣的賦也大為增加，甚至出現了遊覽山水和題寫書畫的賦，這與北宋士大夫安定悠閑的生活有很大關係。晏殊生活在宋賦特色形成的重要時期，雖然他的賦作流傳到今天的僅十來篇，卻有一定代表性，是研究宋賦風格不可或缺的珍貴文獻。

晏殊賦作的特點主要有三：一、內容上無所不包，除了寫冠禮(如《皇子冠禮賦》)、進封(如《親賢進封賦》)外，還寫園(如《中園賦》)、雪(如《雪賦》)、種植(如《西掖植紫薇賦》)，甚至寫木偶(如《傀儡賦》)、青蛙(如《蠃蛙賦》)，還有寫書法(如《飛白書賦》、《御飛白書扇賦》)，仿佛只要興之所在，信手拈來，皆可入賦。二、語言艱深典雅，缺乏深邃含義和形象感。在《中園賦》中，他以大量篇幅描繪了各種植物：「爾乃壇杏蒙金，蹊桃銜碧。李雜紅縹，柰分丹白。梨誇大谷之種，梅騁含章之飾。鳥勃旁挺，來禽外植。櫻胡品糅而形別，棠棣名同而實析。大棹朱柿兮駢發，樽棗安榴兮閑折……」(《元獻遺文補編》卷一)⁸¹並依次狀寫了冥楂、枳椇、葡萄、薤、葵、芹、蒜、瓜、竽等二、三十餘種植物；接着又寫雀、燕、鵲、鷓等多種飛禽，缺乏形象描繪，其中也不時發出議論和反問，「豈不以崇高宅乎富貴，聲教移乎風俗？」「斯遁世之攸處，詎紛華之可瀆？」「懿夫！觀品彙之零茂，識元精之所存」。再如，其《雪賦》從各個方面寫大雪，雖頗有氣勢，卻用語艱深，「玉為田兮藍水，銀做宮兮鯨海光。嘆川路兮難越，念音塵兮不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六)⁸²因為作者的感慨憑空而發，缺乏訴諸感性的藝術形象，所以幾成「押韻之文」。三、通過旁徵博引，造成氣勢，並在描述和議論過程中表達自己的見解。如《飛白書賦》：「昔在軒後，旁羅俊英。乃有蒼頡，思周神明。下侔羽族之跡，上法奎圖之精。始造古文，播於寰瀛。爰及東漢，紀年熹平。其臣蔡邕，譽聞帝庭。矚鴻都之蔽役，掃堊帚而字成。」(《元獻遺文外編》卷一)⁸³「飛白」的字體頗有來歷。「軒」指選字以設教的軒轅氏，「蒼頡」指古文的創造者，傳說蒼頡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為字。「紀年熹平」，指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後適逢修飾鴻都門，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子刷字，蔡邕得到啟發而作飛白書。《書斷》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尋丈，字宜輕微不滿，名曰飛白。」⁸⁴將書法入賦已為少見，能將衆多典故天衣無縫地組織在賦中更非易事。與此篇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御飛白書扇賦》。可見晏殊不但對書法藝術有很深的造詣，對賦這種形式也駕輕就熟。

81 《全宋文》(十)，卷三九七，頁178。

82 同上注，頁180。

83 同上注，頁179。

84 《歷代書法論文選》(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頁164。

宋代散文前期受晚唐五代和西昆派影響，頹靡浮華文風流行一時，柳開、王禹偁等倡導韓、柳古文傳統，反對浮薄文風，接着歐陽修、蘇軾等從實踐上對韓、柳散文進行了繼承和發揚，扭轉了宋初的頹靡文風。晏殊喜歡韓、柳散文，經常誦讀，愛不釋手，他親自校對了柳宗元文集，對韓、柳有精僻的分析，並對韓、柳表示了由衷仰慕：「某少時聞羣進士盛稱韓、柳，茫然未測其端。洎入館閣，則當時雋賢方習聲律，飾歌頌，誦韓、柳之迂滯，靡然向風，獨立不暇。自歷二府，罷辭職，乃得探究經誥，稱量百家，然後知韓、柳之獲高名為不誣矣。邇來研誦未嘗釋手。」（《與富臨丞書》）⁸⁵可見當時晏殊對繼承韓、柳古文傳統，扭轉宋初文風也是積極的。

晏殊寫了許多文章，流傳到今天的不足 50 篇。但從這些文章中多少還可以看出晏殊的散文特點。根據內容和藝術性，這些文章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銘、贊、碑、讀、狀、跋、表、奏等，文字大多古板枯澀，作為史料尚有價值，作為散文則實難卒讀。第二類是表，文笔工整，詞語瞻麗，但缺乏情感和靈性，唸來也覺拗口。寫得較好的如《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代辭昇儲表（二）》。第三類是記。這類散文也用語工整，用詞華麗，也有寫得較平實的，如《庭莎記》寫清思堂中間的空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癯者，芟蕪之役，勞於後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蕪，而又憐卒之勤瘁，思唐人賦咏，間有種莎之說。」（《皇朝文鑒》卷七七）⁸⁶寫出了庭中之莎的由來和作者矛盾而又轉為釋然的心情。再如《五雲觀記》寫五雲觀的由來和地勢，接着敘述了王定國與五雲觀的關係，層層鋪敘，借記觀寫出了王定國超凡脫俗的性格。而《因果禪院佛殿記》用近似於駢句的句式記家鄉臨川的佛寺，因語言拗口和缺乏形象而失之空泛。

晏殊的第四類散文是答、論、札。這是寫得較好的一類。它一反晏殊用語工麗，雍容閑適的文風，而是文笔縱橫恣肆，流暢而有氣勢，且邏輯性強，很具說服力。如《天聖上殿劄子》，作者開門見山地說：「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能治天下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⁸⁷他認為只有先正朝廷才能治好天下，而正朝廷關鍵在於正百官，這卻是最難的。晏殊直抒胸襟，表示了對國事的關心。晏殊還進一步指出：「且人君無職事，惟辨臣下之邪正，實人君之職也。然古今說者以辨邪正為難，臣竊以為不然，在人君用心何如耳。使人君之心，是非好惡每存乎私，則邪正之辨實難；人君之心一循乎大公至正之道，則邪正之辨何難之有？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天下治。方是時，是非好惡無私意故也。及用李林甫、楊國忠，馴至大亂，此其心非不知林甫、國忠之姦邪，特使其能徇己之

85 《全宋文》(十)卷三九八，頁 198。

86 同上注。

87 同上注，頁 202。

私爾。」⁸⁸ 文章從正反兩面說明辨邪正並不難，關鍵是君王自己的把握，只要不存私而徇公，是不會辨不出邪正的。全文立論鮮明，感情充沛，語言平易，雖引經據典而不枯澀，顯然受到韓愈散文的影響。在《論秦穆公用由餘》中，晏殊寫道：「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餘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餘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困學紀聞》卷一一）⁸⁹ 由餘是秦穆公手下的謀臣，曾幫秦穆公向東擴展疆土，但為晉所阻，無法向東發展，只好稱霸西戎。樂毅是燕昭王手下武將，幫助燕昭王大敗齊軍，在齊五年，攻七十餘城。晏殊將二人對比，發表了對秦穆公的評論，頗有獨到見解。在《蕭望之論》中，晏殊對直接勸蕭望之自裁的朱雲表示了不滿：「彼朱雲者，真所謂不得中行而狂狷者也，探赜機心，不迨乎婦人之明。」（《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⁹⁰ 激憤之情，溢於言表。這與那些雍容閑雅的詩文真是大相逕庭。

晏殊寫得最有特色的散文是第五類書信。這類又有兩種，一是答同事，一是家書。答同事的書信，如《答樞密範給事書》、《與富臨丞書》等，皆直抒胸臆，揮灑自如。家書則顯得迂徐平淡，親切動人，處處流露真情，是晏殊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如《答贊善兄家書》，是晏殊收到其兄嫂給他寄的生日衣服及孩子的一些禮物後，介紹一些自己的情況：「殊家間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定其兩數，或回換買他魚肉，亦只約豬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為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邊事尚未息，須當他委重任，乃建節，或兼見命，必不於優閑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徐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元獻遺文》）⁹¹ 平日的束縛和應酬在此看不見了，晏殊随心所欲地、無所顧忌地陳述自己的思想，深沉渾恬。在《答中丞兄家書》中，晏殊寫道：「知令讀書否？假如性不高，亦令讀書，學詩學禮。宜親老宿有德之人，所冀向後自了得一身，免辱門戶也。此最日夕急切事。二十七寧殿直二年，大段听人言語，謹卓不曾出入，兼識好慈善得力，免勞人心力，亦應是從有家累，知惜身事兄弟，且免一件憂煎。因信上聞，希令諸子知之。若能稍學好事，免為人所嗤笑，成立得身，父母一生放心有望矣。」（《元獻遺文》）⁹² 作者言辭中充滿長者對小輩的牽腸掛肚和殷切期望，流露出作者的深厚感情。語言委婉動人，令人慨嘆。晏殊這類散文沒有在文字上裝腔作勢，字裏洋溢着舐犢親情。這是太平宰相的另一面。

88 同上注，頁 184。

89 同上注，頁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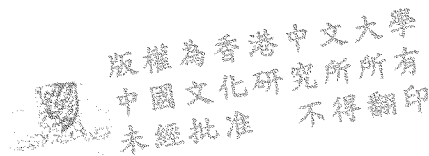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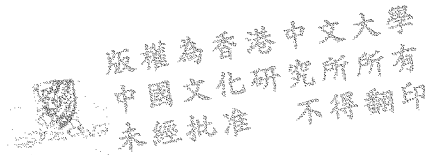
90 同上注，頁 201。

91 同上注，頁 194 - 195。

92 同上注，頁 195 - 196。



把晏殊放在北宋文化發展的軌跡上，從他振興教育、引薦人才、整理古籍，以及他的藝術涵養、詩文主張及詩、詞、賦、文創作等方面考察他與北宋文化的關係，對於進一步了解晏殊和研究北宋文化，或許是有益的。本文所以提出一些不甚成熟的思索，旨在引玉拋磚，以圖引起更多同行對「晏殊與北宋文化」這一命題產生興趣，作進一步研究。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Yan Shu and the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ummary)

He Mian Shan

The cultural ascendanc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Yan Shu. However, since most of the 240 *juan* 卷 selections of Yan Shu have been lost, this makes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make a study of Yan. For this reason, even today the study of Yan Shu is still confined to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his poem entitled *Zhuyu ci* 珠玉詞. Placing Yan Shu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is relations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pinpoint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at culture by his v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commenda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putting in order of ancient books, artistic attainments, proposals in poetry writing, and his poems, *ci* 詞 poems, descriptive prose and literary composition.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